

北京市中小学
语文教育

50 年

北京市语文学研究会 编

Beijing Shi Zhong Xue Yu Wen Jiao Yu

开明出版社

北京市
中小学语文教育
50年



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 编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市中小学语文教育 50 年 / 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编 . - 北京 : 开明出版社 , 1999.9

ISBN 7-80077-444-9

I . 北 … II . 北 … III . 语 文 课 - 教 学 法 - 经 验 - 中 小 学 - 北 京
IV .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0807 号

北京市中小学语文教育 50 年 (1949—1999 年)

编者 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

出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印刷 怀来县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总店

开本 大 32 开 印张 19.125 字数 475 千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7-444-9/Z · 1

定价 26.00 元

序

这是一本凝聚着北京地区语文教育工作者心血的书，光灿灿的，沉甸甸的。

它展现了一条穿越五十年漫长岁月的路，无数跋涉者在坎坷的路上行进，他们用无私的奉献创造着耀眼的辉煌。

自有教育始，就有语文教学。所以，这是一门历史最久的传统课程。而自有语文教育始，就有应当如何教和如何学的争议，所以，它又是一门不断遇到新问题的课程。语文教学的内容博大精深，引起专家们无穷尽的探究，语文应用的普遍性又使得人人都可以对教学工作发表意见。听说读写作为工具，它是最基础的工具，而语文的深刻内涵又在塑造着人的灵魂。这些是人们对这门课程始终给予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纵观这五十年语文教育的历史，语文教学改革始终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社会发展的旋律，教育改革的旋律常常在语文教学上奏响最强音。这门功课，影响着学生的理想、信念、品德、情操，影响着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发展，所以，它的教学目的，始终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门功课，让教师付出的最多，让学生付出的也最多。所以，它的教学效益，自然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追求。五十年来，语文教育工作者正是在实现教学目的和提高教学效益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当然，也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过一场又一场斗争。这本书正是真实地描绘了这一历程。

纵观这五十年语文教育的历史，最灿烂的篇章还在这后二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既有前三十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积淀所提供的营养，又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观念、新知识的冲击，以及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解放之后产生的极高的热情。这些交汇在一起，于是一批新的优秀的语文教改成果便勃然而生，一批新的优秀的语文教师也就同时涌现出来了。

这本书生动地回顾了建国以来语文教育的历史，它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反思。在新世纪的门槛前，我们展望前程，不仅面临着曾经遇到过的问题，还将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我们勇气、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铺设了攀登的阶梯。所以，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向在语文教学战线上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同志们，致以由衷的敬意。

陶西平

1999年8月

目 录

上篇 十七年的北京语文教育(1949—1966年)

第一章	十七年北京语文教育概述	(3)
第二章	十七年北京中学语文教育	(18)
第一节	中学语文教师的培训	(18)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	(31)
第三节	中学语文教材建设	(38)
第四节	中学优秀语文教师及其教改成果	(60)
第三章	十七年北京小学语文教育	(109)
第一节	小学语文教师的培训	(109)
第二节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	(117)
第三节	小学语文教材建设	(120)
第四节	小学优秀语文教师及其教改成果	(125)

附录

一、	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纲要(初稿)	(153)
二、	小学语文评分标准(参考资料)	(192)
三、	关于中学语文课本教学参考资料的 “总说明”	(203)
四、	北京市对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初中、 高中和师范学校语文教材的审查情 况小结	(212)

五、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目录(1959年版)	(215)
六、北京市小学语文课本目录(1959年版)	(227)
七、北京市耕读小学语文课本目录(1965年版)	(239)
八、关于“教师之家”的情况汇报	(244)
九、关于语文教学的几个调查材料	(254)
十、纠正“全国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的极 “左”偏向	(271)

中篇 “文革”十年的北京语文教育(1966—1976年)

第四章 “文革”十年北京语文教育概述	(279)
第五章 “文革”十年的北京语文教学	(285)
第一节 “停课闹革命”，语文课中断	(285)
第二节 “复课”与被“革命”的语文教学	(285)
第三节 健康力量的抵制与抗争	(290)
第六章 “文革”十年的北京语文教材	(292)
第一节 “复课”时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292)
第二节 “五·五分段”新学制的语文教材	(294)
第三节 “四人帮”对教材编写工作的干扰 和破坏	(295)

附 录

一、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文化课	(298)
二、“批林批孔”儿歌选	(307)
三、主动学 自己学	(308)
四、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目录(1972年版)	(318)

下篇 新时期的北京语文教育(1978—1999年)

第七章 新时期北京语文教育概述	(333)
第八章 新时期中学语文教育	(345)
第一节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	(345)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材建设	(379)
第三节 中学优秀语文教师及其教改成果	(409)
第四节 中学语文教师的培训	(440)
第九章 新时期北京小学语文教育	(454)
第一节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	(454)
第二节 小学语文教材建设	(467)
第三节 小学优秀语文教师及其教改成果	(479)
附录	
一、关于社会各方面所需要的语文能力的 调查报告	(516)
二、加强与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意见	(536)
三、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目录(上海、 浙江、北京、天津合编)	(543)
四、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 试用课本目录(北京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编)	(564)
五、北京教育学院91级汉语言文学续本科班 教学计划表	(593)
六、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教学计划	(594)

上 篇

十七年的北京语文教育

(1949—1966 年)

第一章 十七年北京语文教育概述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之前，十七年的北京语文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党的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健康发展的。其间虽然也经历曲折（主要是1957年“反右”而导致的“左”的干扰和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破坏），但时间较短，纠正较快，相对于后来的“文革”的摧毁性的破坏来说，损失要小得多。

党对教育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新中国刚刚建立，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北京就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马叙伦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他说：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新编中国现代史》5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一方针也就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最初几年的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1957年以前的北京语文教育，大体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一方面是继承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传统，同时又认真地学习苏联的母语教学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新的语文教育，探索语文教学改革，从而使北京语文教育不断向前推进，向前发展。

十七年，对北京语文教育而言，基本上是一个重新建设的时期。这一建设，反映在课程、教材、教法几个方面。语文课程建

设的主要标志是 1954 年，由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所编的《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纲要（初稿）》和《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计划纲要（初稿）》。这两个《纲要》分别制定了小学、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规定了各年级语文教学（包括阅读、作文、语法、字词）在学年终了时应达到的水平。《纲要》既是教学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学的标准。为帮助教师掌握检测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的标准，北京市教育局小学教育科还编印了《小学语文评分标准》供教师参考。在编写《纲要》的同时，还编写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和使用，对于帮助广大教师掌握教材，按照《纲要》的要求进行教学，从而达到《纲要》所规定的标准，起到了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在执行《纲要》的过程中，也同时提高了教师的水平，增强了教师与课程建设之间的适应性。

十七年，北京市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方面的主要成绩是：1959 年，由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组编的小学语文课本 12 册，初高中语文课本 12 册。这以前，北京市基本上是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在 1958 年“教育大革命”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受到批评，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也停用之后，北京市所编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其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深浅适度、分量适中等特色，赢得了北京市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欢迎，对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发挥了作用。这套教材一直沿用至 1963 年。在教材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 1964 年至 1965 年编写出版的《北京市耕读小学语文课本》（只编了四册）。1964 年，北京市郊区农村还有 25% 的适龄儿童没有入学。为了使这些孩子不再成为新的文盲，一些生产大队便开始举办耕读小学或耕读班。这套课本便是为此而编写的。这两册课本极富农村特色，从内容来说，以识农用字为主，其中也穿插编进一些农家儿歌、故事等，很受欢迎。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骤然而至，这套课本便夭折了。

北京市所编的语文教材，一方面借鉴了全国其他地方所编的

教材；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教材的编写。像当时北京教材中所编进的一些课文，至今仍为各版本中的语文教材所选用，就是实例。从这一点说，北京市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建设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在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和探讨方面，五、六十年代正处于起步阶段。虽没有系统的成熟经验，但在某些“点”上，还是很有成绩的。像北京景山学校“分批集中识字”的经验，北京实验一小王企贤老师的小学高年级词汇教学的经验，王有声老师的小学作文教学的经验，北京师大附中时雁行老师关于文学作品教学的经验，北京师大女附中周学敏老师的中学作文教学的经验，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以后尤其是新时期多元化活跃的语文教学改革来说，既是良好的开端，同时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市委对北京市的语文教育是非常关心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在关键的时期，召开专门的会议来研究语文教育的问题（例如1959年12月，召开语文教学会议，提出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问题；1961年12月，再次召开语文教学会议，就语文教学的目的、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鲜明地提出了正确意见。1963年，第三次召开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会议，深入讨论了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问题），及时为语文教学改革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许多领导同志，深入学校，调查研究。或许因为北京市是首都的缘故，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曾深入学校，亲切聆听教师们的意见。他们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的态度，他们严肃认真、扎实实在的作风，给广大教师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同志的回忆文章里，都记下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片段。例如：

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一〇一中学视察。他亲自到教师宿舍，同语文教师亲切交谈，并征询对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意见，教师们受到极大鼓舞。

1955年暑假，市教育局组织一批教师修订《北京市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工作开始后不久，副市长吴晗同志就来到教师们中间，并同语文编写组的全体人员一起座谈。他对大家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后，还风趣地说：“明代虽编过一部《永乐大典》，这是宏伟的工作。但是比起大家所编的教学参考资料来，则大为逊色。”对于这些辛苦工作了一个学期，又冒着酷暑紧张编写的老师们来说，这一席话是多大的鼓舞啊！

吴晗同志对语文教学的关心，绝不仅于此。陈哲文同志曾回忆说：《语文小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也完全是在吴晗同志的关心和领导下进行的。

1960年，吴玉章同志到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听了一节汉语拼音教学课，认为讲得很好。事后，吴老还对汉语拼音教学及语文教学的另外几个问题，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

1961年，东城区二十二中的语文成绩在全市中考中名列前茅（东城区第一名），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市委文教部长张文松同志亲自到校蹲点、听课整整一个学期。

在1959年北京市语文教学工作会议上邓拓同志的报告里，曾详细地谈到宣武区四十三中的工作，谈学校领导如何深入教学，谈教师虚心学习先进经验，谈“老带新”提高师资水平……。从报告里，可以看出邓拓同志对学校教学情况的深入了解。原市教材编写组第一任组长胡朝芝同志还曾回忆说：“邓拓同志对语文教材的编写非常关心，连文言文该选什么、不该选什么，都提出过具体意见。”

这样举例肯定是挂一漏万的，但有了这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就可以知道“党的领导和关怀”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对许多具体事实的概括；还可以知道党的领导干部，许多是高级干部，他们对语文教育的特别重视，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精神和优良的作风。

五、六十年代，北京市的语文教师队伍是非常优秀的。这不

仅表现在他们勤奋地学习新的知识，夜以继日地忘我的工作，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因而创造了难以想象的高效率（如1954年、1955年《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1959年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等）；也不仅表现在他们在教学实践中，研究探索，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尤其表现在对于一些违反语文教学规律的做法，他们敢于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言勇谏，坚持正确的主张。如1961年，针对“全国高考评分标准”中的一些极“左”的提法，北京一中的孙仲礼老师、五中的汪宗藩老师等，在吴晗同志、陈哲文同志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修改评分标准的“意见书”，向历届“高考作文评分标准”和“1961年高教部修订稿”发难。这在实质上是对反映在高考中的极“左”路线的抵制和斗争。这件事的结果是高教部接受了这些意见，修改了评分标准，并于当年施行。老师们的所做所为，不能不说这是对语文教学的一大贡献。从他们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里所反映的不仅是他们在语文教育上的很高的水平，而且反映出他们优良的政治素质。

对语文教育来说，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语文学科的目的、功能的问题，一个是语文教学的“序”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语文教学的目标、语文教材的编写、语文教学的方法、语文教学的质量。两个问题相比，第一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纵观北京十七年的语文教育，始终是在围绕着语文学科的目的、功能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实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着语文教育，创造着新鲜的经验。而语文教育方面的曲折与斗争，甚至失败，也是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密切相关的。

语文学科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本世纪初（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学务纲要》里面说：“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篇幅亦不取繁冗。由浅入深，由短而长，勿令学生苦其艰难。中小

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这段话既规定了语文一科所教的内容，选文的要求，也规定了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写作）和学生应达到的水平——学会写“官私实用”的文章，达到“明通”即可。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国文科教学的要求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与上述《学务纲要》中的“中国文学”科只注重培养学生写的能力相比，《细则》要求国文科教学应发挥多种功能——除培养“写”的功能之外，还要培养阅读理解能力，启发智力，培养品德，涵养兴趣等。这个《细则》中对课文功能的规定，影响了1923年公布的小学、初中《国文课程标准》和1936年的中小学《国文课程标准》。换句话说，《课程纲要》也好，《课程标准》也好，在语文科的功能方面，都是在突出读、写能力的基础上，反映出综合性的特点。

以上是见诸官方文件的关于语文科的目的、功能的规定，那么语文教师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

解放前的教师是“自由职业者”。“各种教学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要求。特别是语文教学，都是由教师自选教材，喜欢什么就教什么，教师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教学”（刘学仁《五、六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解放前没有官办的出版社编写、出版的统一教材，没有教研机构领导和管理教学，也没有中考、高考这种省市、甚至全国的统一考试。在这种情况下，语文教学怎么教，当然就是教师说了算。语文教师对语文科目的、功能的理解也不会很一致。

《人民教育》1950年第1卷第2期发表了董纯才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育》，文章中在分析了当时东北的中学国文教师的三种类型及其在教学中的不同表现之后，说：“从前面所讲的情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国文教员对国文教学的目的还缺乏一致的明确的认识。因此有些人单纯着眼于语

文技巧的教学；另外有些人，只偏重于国文课中的思想教育问题，各走极端。”解放初期的北京，在一段时间里，语文课更偏重于思想教育的倾向，显得更为突出。1949年下半年，北京市小学用的课本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编写的《国语课本》，中学用的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的《中等国文》，这些课本选文的内容，政治性都比较强，如歌颂共产党、毛主席，讲土地改革、翻身闹革命，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等等。这样的内容，又是处在解放初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之下，语文课偏重于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比较突出，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语文基础知识和语文基本技能的教学被忽视，尽管教师非常努力，但语文教学质量不高。

1953年“红领巾教学”的经验总结之后，语文教师对于教学的教养目的更加明确，了解了教学的文学因素和语言因素，并开始进行启发式教学。

1954年北京市委作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简称《五四决定》)。《五四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成为学校中广大师生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根据《五四决定》的精神，北京市教育局组织了编辑教学参考资料的工作。北京市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小学语文组在当年就编出《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纲要(初稿)》。中学语文组编出了《中学语文教学计划纲要》(但没有找到原文)。《纲要》明确规定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

给予学生初步的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阅读、发表（口头的和书面的）、书写等能力。

在给予学生语文知识和培养学生上述能力的过程中，启发学生对祖国语言和文学的爱好；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阅读、语法、作文、写字等课在发展学生的语言这一共